

《四库全书》与李朝后期的文坛动向

陈冰冰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韩语系, 北京 100024)

摘要:通过当时朝鲜知识文人和统治者对《四库全书》的不同认识和看法以及李朝后期文学创作和文体的变革,揭示《四库全书》给朝鲜文坛带来的巨大影响:当时朝鲜统治者为巩固统治而统一文学思想,提倡使用纯正文古文体,但这一主张遭致朝鲜文人的反对和抵制。

关键词:《四库全书》;朝鲜;李朝;文体反正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1)04-0105-05

《四库全书》编纂于清乾隆年间,自1772年开始,经过10年编成。《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中国典籍史上最后的,也是规模最大的官纂校录,该书收录了书籍3457种,共79090卷,总目中记有书名,而未被收录进去的“存目”的书籍也有6000多种。18世纪,清朝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一方面使用武力加固社会的安定,另一方面则通过对文学和文化控制进一步抑制人们的思想,特别是汉族文人。他们倡导“复古思潮”,使文人的注意力由现实问题转移到对古籍的学习和整理上,并多次举行大规模的书籍编纂活动。这种活动表面上看来是出于对图书文献的保存和整理,实际上是清朝政府为了消减汉族人们的抵抗情绪而实行的一种文化策略,他们把有关反对清朝统治的文章和书籍重新编版或直接进行销毁,《四库全书》的编纂就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文化产物。以《四库全书》为代表的图书编纂活动给中国的学术和文化带来了非常巨大的影响,是中国文化事业的一大巨献。同时,《四库全书》的问世在朝鲜文坛也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特别是给李朝后期文学的变革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本文以此为切入点,着重分析李朝社会的文人对《四库全书》的独特见解,以及该巨著对以正祖为代表

的李朝统治者的影响,进而揭示李朝后期文坛发展的动向。

一、朝鲜学者对《四库全书》的认识和评价

《四库全书》问世的时期,相当于朝鲜李朝的后期,中朝两国不仅在政治上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文化上的交流也日益频繁,而书籍的输入和输出则是这一时期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的朝鲜使臣从中国购回的物品中,书籍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书籍和最新出版的书籍则成为他们关注的对象。李朝文人对《四库全书》一直非常感兴趣,李朝正祖也曾多次派人到中国去购买。《四库全书》中收录了一部分朝鲜人的著作,徐浩修在《燕行记》中有如下的记载,“纪曰:‘贵国郑麟趾高丽史,极有体段,仆藏皮一部矣。’余曰:‘然则高丽史已翻刻于坊间乎?’纪曰:‘即贵国板本也,贵国徐敬德花潭集,编入四库全书别集类,外国诗文集之编诸四库,千载一人而已。’”^[1]

根据上述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徐敬德的《花潭集》和郑麟趾的《高丽史》都被《四库全书》收录在

收稿日期:2011-06-30

作者简介:陈冰冰(1981-),女,安徽亳州人,讲师,文学博士。

内,我们还了解到《高丽史》原是在朝鲜刊行的版本,而这一内容并未在《四库全书总目》中留有记载,徐修浩的这一记载对我们研究《四库全书》是很有价值的。此外,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也提到了徐敬德的《花潭集》,但是朴趾源认为徐敬德的诗文虽然有若干篇,但是“无可观”。其实,徐敬德的《花潭集》只是在存目中留有书目,其内容并未记载在《四库全书》中,只是《四库全书总目》中记载到“诗文虽不入格,特存其目,以表其人焉”。朴趾源当时并未看到《四库全书》的原文,所以才误以为《花潭集》已编入其中,不过他所说的“无可观”同《四库全书总目》中的记载还是一致的。《花潭集》中的诗文并非是特别优秀的,但却是惟一被收录在存目中的外国人诗文集,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

如上所述,清朝时期的图书编纂活动是为了巩固政权而对当时的知识分子实行的一种怀柔政策,目的就是要把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图书的整理和编纂上来。《四库全书》的编纂活动自然也不例外,参与此活动的学者被分成20个官职,共362人。除此之外,还有从事誊录者2800多名,佣人1000多名,此次编纂活动共出动人员4200多名。

这些人员中只有少数一部分在中国史料中能够找到相关记载,其余大部分人员的事迹很少被记载下来,而朝鲜学者对这一部分人格外的关心,他们作品中的记载弥补了中国资料在这方面的不足。例如,朝鲜著名的文学家、实学思想家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对皇六子永瑔的外貌作了详细记载,永瑔虽贵为皇子,但是缺乏贵族气质,“面白而痘瘢狼藉,鼻梁低小,颊辅甚广”。中国史料中虽然有不少关于永瑔的记载,但对其容貌描写如此详尽的仅朴趾源一人。不过除了外貌,朴趾源对永瑔的评价还是极高的,“能文章工书画”,所以他作为《四库全书》总裁官还是理所应当的。作品中还记载了一些专门从事誊录工作的人员,他们主要以誊录官的身份参与《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每月的工作量也是相当惊人的,朝鲜文人李德懋在其《入燕记》中记载道:“绍薪方充《四库全书》誊录官,自言一月誊五万字。”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从事誊录工作的人员每月要誊写5万字左右,其工作量是相当惊人的。

这些参与编写《四库全书》的文人,虽然都拥有较好的文笔和卓越的文才,却不得不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规模巨大的图书编纂工作上,以至于很难有机会把蕴含自己真正思想的文学著作留给后人,这便达到了清朝统治者大规模编写《四库全书》的

真正目的。乾隆帝大举编纂《四库全书》,一方面是昭告天下自己对文学的热爱、自己的好学;另一方面,也就是其主要的目的则是为了抹杀反清思想,稳固自身的统治地位。《东华录》中记载道:“至书中即有忌讳字面,并无妨暗,现降谕旨甚明,即使将来进到时,其中或有妄诞字句,不应留贻后学者,亦不过将书毁弃。传论其家,不必收存,与藏书之人,并无关涉,必不肯因此加罪。”对于这一点,中国的学者往往采取回避的态度,所以中国的史料中并未留下充分的论述,而朝鲜学者没有身份上的限制,自然就少了很多的忌讳,他们的评价则更具体一些。

当时的李朝学者并没有真正接触过《四库全书》原书,所以他们对《四库全书》本身的评价是比较空洞的,洪良浩在《燕云纪行》“皇都即事”中记载:“节制八旗恢远略,铺张《四库》盛文儒(时皇帝大聚天下书分经史子集,名为《四库全书》,合数万卷,募士民有文笔者给禄缮写,故云)。升平五纪超前代,只是衣裳异典谟。”这些评论仅仅是流于一般的赞颂,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可言。

但是朝鲜学者对《四库全书》的修书动机及其影响的评论还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就对这一点进行了具体阐述,他认为“皇帝集天下之士,征海内之书为《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率天下而唱之曰,此紫阳之绪言,而考亭之遗旨也。其所以动遵朱子者,非他也,骑天下士大夫之项,扼其咽而抚其背。”康熙时代的《古今图书集成》和乾隆时代的《四库全书》的编纂一样,并不是所谓的标榜朱子主义的文化政策,而是和《永乐大典》的编纂一样,是为了更好地统治汉族知识分子而进行的一种思想上的压制,朴趾源通过简单洗练的语言透彻地揭示了清朝统治者编写《四库全书》的真正目的。

另外,通过大规模的图书收集,把其中对清朝统治者不利的部分删除掉,这也是编纂工作的主要目的。从1774年至1793年,清朝政府共禁毁书籍3100种,15万部。朴趾源认为清朝大举编纂《四库全书》,其实质跟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并无太大的区别,只是跟秦始皇相比,乾隆帝做得更巧妙一些,称“其愚天下之术可谓巧且深矣”。清朝统治者并没有像秦始皇那样光明正大地对图书进行焚烧,对文人进行坑杀,而是打着“崇古右文之治”的旗号,来实现自己同样的目的,这种看似平和的图书编纂活动,其实比秦始皇的焚书来势更猛。

当然,《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中国典籍的保存也是有着重要意义的。虽然众多的书籍被烧毁,但是很多个人的藏书经过收集和誊录,得以向大众公开,得以在社会上广泛的流传,这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还是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四库全书》是探索中国学术源流的一种重要途径,它涵盖了中国文化的精髓,书中还记载了很多关于先进文化和技术的内容,这些不仅是对中国、韩国和日本,乃至整个东亚、西亚的发展都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大大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二、《四库全书》与朝鲜正祖的文体改革

(一) 李朝正祖的“文体反正”

李朝中后期以来,朝鲜文坛一直受到晚明文风的巨大影响,自许筠(1569~1618)以来,晚明时期的文集便开始流入朝鲜,并给朝鲜文坛带来了巨大影响。他在《闲情录》中引用的大部分书籍都是当时李朝社会所批判的小品文和杂说。洪万宗(1643~1725)在《旬五志》中写道:“至大明末,诸文士尤尚浮藻,凿空构虚辄成一部,至于坐衙按簿之官,越视职事,务得新语。”这本书写于1678年,也就是说在17世纪末朝鲜文坛就已经出现了有关晚明文风过于浮华的评价,但当时并未形成主流思想,直到李朝正祖(1776~1801年在位)提出“文体反正”之后,朝鲜文坛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李朝后期,性理学逐渐丧失了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实学与西学逐渐盛行,所以这一时期的朝鲜文坛呈现出多种文体盛行的局面。明末清初小品文的风靡以及稗官小说的盛行,都对朝鲜文坛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因为这些都属于和正统文学相背的非主流作品,作品的内容与统治者治国安邦的正统思想背道而驰。为了强化王权,以李朝正祖为首的统治阶层立足于朱子学“道文一致”的文学观,强调六经古文的“纯正的文风”。同时,正祖还提出了“文体反正”,即把无“道”的存在的新式文体,转化成“道”在其中的旧式文体的一种文学运动,同时还将此作为国家纪纲来统一文人的思想,把批判浮华不实的晚明文风作为国家政策来执行。既然这一问题在17世纪已经出现,为什么会等到正祖继位以后才正式对李朝文风进行整顿,并将此定为国策来执行呢?这一点和当时在文坛中流行的《四库全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正祖自继位初便特别关注《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他曾专门派进贺兼谢恩使徐浩修前往清朝去购买《四库全书》。之所以正祖特别关注《四库全书》,是因为该书中的很多主张同正祖的思想是一致的,如《四库全书》的宗旨是“朱子尊崇”、“崇尚雅醇”,凡是与此宗旨相违背的书籍则全部销毁,只在存目中留有记载,这一点和李朝统治者禁止“稗官杂记”的传播而实行的“文体反正”的宗旨是一致的。正祖认为,稗官小说原非正统文学,其内容“噍杀鄙俚”,是蛊惑民心的罪魁祸首,也容易使知识文人陷入异学。而这些论调与《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识部分中有关晚明文风的记载是相一致的,“是编皆其笔记之文……大抵词义轻薄,不出当时小品之习”。

清朝政府一方面排斥当时拟古文派的文风,另一方面对那些浮躁轻薄的文风也进行严厉的批判,这一点和朝鲜正祖的主张是十分相似的,而纂修《四库全书》时,“厘正诗体、崇尚雅醇之至意”(《四年全书总目》)为正祖大举开展“文体反正”运动提供了依据,以此纠正当时耽于稗官小品的创作文风,所以《四库全书》的编纂活动才会受到正祖的格外关注。

正祖认为:“大抵文体随世不同,而一世之间亦或屡变,惟时之所尚而其盛衰兴替,未尝不与政通矣”^[2]。文学与政治是一脉相通的,要想巩固好国家的统治,首先要把文学思想统一起来。在其统治期间一直提倡使用纯正文古文体,他认为文人一旦陷入小品文的创作,便会无视人伦,违背义理,而要返回正道则必须消灭小品文。正祖还认为做文章没有古今之区别,其道理都是一样的,同时还将此制定位为一种文化政策,要求朝鲜文人必须遵循这一规则进行文学创作。

可以说,《四库全书》的出现给正祖的“文体反正”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也更加坚定了正祖肃清文风、纠正文体的信念。于是,正祖于1794年下令消除以稗官小品体为代表的杂文体,倡导正统的古文体,主张还原纯正的文体,这就是所谓的“文体反正”。正祖推行“文体反正”,一方面把传统的古文体树为人们应该效仿的文章典范,另一方面还设立了宫廷研究机关奎章阁。正祖把国内的学者召集在此讨论经史,出版书籍,以摘选朱子语类的《朱子选统》为首,刊行唐宋八大家著名的古文集。正祖还下令禁止清朝的稗官小说和杂书的输入,正是由于“文体反正”的实行,导致朝鲜朝后期刚刚兴

起的稗官小品体文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而逆时代的古文文风盛极一时,所以“文体反正”是正祖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和封建社会秩序而实施的,但这一政策扼制了人们积极进步的思想,成为逆时代潮流的一种文化政策。

(二) 文体改革下的文人动态

正祖在进行文体改革之后,李朝社会的稗官文学创作也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一部分文人坚持稗官小品体的创作,他们最终遭受迫害,如李钰、金祖淳、南宫辄等。特别是李钰(1760~1813),他坚持主体意识下的民族文学论,认为文学应该随着时间和地域的变化而变化,任何一种文体都不应该一成不变,所谓的古文体已经不能够反映现实问题,他反对法古,强调写实性的文学表现手法,并且在参加科举考试时也使用稗官小说体撰写文章,所以正祖十分反感他,结果是李钰不但科举考试一再落榜,最后还落了个“停举”、“充军”的下场。虽然李钰因为稗官文体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他始终不向权势低头,一生坚持小品文的创作,对朝鲜李朝小品文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而另一部分文人采用比较迂回的策略,避免与正祖提倡“文体反正”的主张正面冲突。虽然这部分文人同拟古派一样力推古文,但是他们主张学习六经古文和唐宋古文的创新精神,创作出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文学,这就是著名的“法古创新”,而这一思想的主要倡导人就是实学派代表朴趾源。

以朴趾源为代表的朝鲜文人表面上依据古文体进行创作,而实质上是以儒教为基础主张进行社会改革。他们所提出的创作应该摒弃传统习惯上的模仿,应该创作出反映本国国风的朝鲜诗、朝鲜文章的主张深得正祖的认可,所以以朴趾源为代表的朝鲜文人,如李德懋、朴齐家等,即使被发现存在文体上的问题,并没有受到正祖的严惩,只是命其写自责问。可以说,这批朝鲜文人在文体改革的浪潮下,不但没有被吞噬,反而取得了更大的辉煌,创作出朝鲜文坛上较具有代表性的燕岩文学,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热河日记》。该小说主要以当时的朝鲜为社会背景,采用大量的朝鲜谚语和俗语,反对使用奢华虚浮的语言,反对盲目模仿汉唐文学和文体;同时也揭露了当时社会存在的弊端和矛盾,提出了一些改革和发展社会的实质性观点和主张。

正祖的“文体反正”虽然表面上净化了朝鲜的文风和文体,使纯正文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是这种以六经古文作为纯正文学典范的创作要求已经不

再适应时代的变化。同时,稗史小品体也并没有因为统治者的阻挠而销声匿迹;相反,稗官小品体、小说等新文体依旧在朝鲜社会广泛流传。

三、《四库全书》与朝鲜后期的文学创作

当时的朝鲜文人对《四库全书》的编纂非常关心,朝鲜学者李德懋曾于正祖四年(1780)这样记载:“《四库全书》踰十万卷,活字先印其最要者二万余卷,活字即木字也,其序即诏文也,后当得送。”这里所说的“活字先印其最要者二万余卷”指的是《四库全书》的聚珍版,这一工作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始,一直持续到乾隆五十九年(1794),虽然只是《四库全书》的一部分,但是已在当时的朝鲜社会引起了如此大的反响,这足以看出当时朝鲜文学界对这部书籍的关注。

进入李朝社会,中朝两国文人学士交往更加密切,许多赴清使节回国后极力主张向清朝学习,包括学习清朝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这就是所谓的北学派。“北学”一词是由朴齐家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游北京归来后所著《北学议》而来。北学派对朝鲜国内相对于清朝的种种欠缺做了较为全面的检讨,主倡北学,其中自然包括对文学创作的学习和借鉴。

北学派代表朴趾源、李德懋等朝鲜四大家提倡新文学,他们反对古文的枯燥无味,倡导使用更具生命力、词藻优美的新文学,这一主张同《四库全书总目》流入朝鲜有着极大的关系。《四库全书总目》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在乾隆末年编成印行不久后传入了朝鲜。朴趾源等进步文人在接触了《四库全书》的小识部分以后,指出明末清初的公安派和竟陵派所使用的语言中有很多是属于“妙慧”、“奇诡”、“尖酸”的范畴,并且强调“平日于文学好看批评小品,探索者惟是妙慧之解,深味者无非尖酸之语,此等虽年少一时之嗜好,渐到老实则自然刊落。”他主张“法古创新”,提出要克服拟古文和骈体文的弊端,学习六经古文及唐宋古文的创新精神。

当时朝鲜进步文人一方面肯定古文的典范意义,而且还把它们作为文章创作的基础;另一方面反对过于追求创作的技巧和浮华的辞藻,指出文章应该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要以真实的语言反映最真实的社会生活,创作出切合时宜的文章。此外,拥护公安派代表袁宏道的李德懋也多次强调不要学习

明末清初文集及稗官小品中的“浮靡”、“轻薄”的风气,他指出“毋或浮靡,字句之间,慎勿犯用俗所谓小说及明末清初一种比例轻薄口气”^[3]。

主张北学的进步文人一直关注着清朝文坛的发展动向,他们早期也曾是公安派和竟陵派的倡导者,甚至一度把袁宏道等人作为学习和模仿的对象,然而《四库全书》的问世让他们的文学观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以至于在正祖九年以后,这些文人基本上没有再进行过小品文的创作,这虽然跟正祖所实行的“文体反正”有一定的关系,但《四库全书》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另外,朝鲜的著书也纷纷效仿《四库全书》的编写,很多目录的分类、提要的撰写都仿照《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正祖五年(1781),由徐浩修编纂的《奎章总目》就是仿照《四库全书》编写而成的,其中也分成经、史、子、集4个部分,并且还收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12本。《大畜观书目》(成书约在正祖中期)也收有《四库全书总目》16套(函)共144册、《四库全书目录》(即《四库全书简明目录》)12册。另外,洪奭周的《洪氏读书录》也是分成了4部,各个部分前都著有小序,每本书中均拟有提要,甚至连提要的写法也跟《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中的提要非

常相似。《海东绎史·艺文志》一书更是大量直接抄录《四库全书》提要(包括提要内容及书籍来源),对所著录的图书进行介绍。

四、结 语

综上所述,朝鲜文献中保存相当多关于四库学的研究资料,这些资料可以作为中国文献的参考,弥补中国文献中存在的缺漏,从而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研究《四库全书》及其相关文献。《四库全书》的编纂虽然是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抑制文人的思想而实行的一种文化手段,但是对中国古文献的保存和传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不仅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还牵动了整个朝鲜文坛,对朝鲜后期文学的改革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徐浩修. 燕行记:卷3[O]. 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
- [2] 李 算. 弘斋全书[O]. 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
- [3] 李德懋. 雅贞遗稿[O]. 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

The *Si Ku Quan Shu* and literature tendency in later period of LI Chao

CHEN Bing-bing

(Department of Korean,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and viewpoints of the rulers and men of letters at that time about the *Si Ku Quan Shu*, and the literature creation and reforms in the later period of LI Chao.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 *Si Ku Quan Shu* has had great influence on the Korean literature. At that time, the Korean rulers, in order to safeguard their ruling positions, tried to unify the literature ideology and advocated their so-called “pure” and ancient writing style, but were completely opposed and refused by Korean men of letters.

Key words: the *Si Ku Quan Shu*; Korea; LI Chao; writing style revolution